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三进’教学改革与理论研究”专栏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德文版中的 翻译创造性探析

廖峻

(四川外国语大学 德语学院,重庆 400031)

摘要: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版本中,翻译创造性在语言转换、文化输出、交际效果等方面都有突出的体现,对其进行分析研究有利于深化对政治外宣文本的翻译和研究,契合了“三进”工作对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的要求。不论是从宏观层面梳理学界对翻译创造性的认识,还是在微观层面以第四卷德文版中译例为对象进行分析,都有助于深化对于创造性在外宣翻译中的产生机制及作用的认识,而“新颖性”“适当性”和“美学性”可以作为考察翻译创造性的三种维度,促使高校在语言和翻译教学中把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更好地发挥“三进”对高校外语课程思政建设的引领作用。

关键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翻译创造性;“三进”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4)04-0171-12

0 引言

2023年,包括德、法、日、俄、西、阿、葡及中文繁体在内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多语种版本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公开发行,这不仅有助于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增进海外人士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理念和实践的认知,为他国的发展提供启迪和借鉴,也为我国深入推进“《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版本进高校、进教材、进课堂”(以下简称“三进”)工作提供了最新的理论指导和教学资源。

作为“深入宣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实践”“培养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的有力抓手”和“建构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关键环节”(中国外文局,2023),经过近五

收稿日期:2024-02-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重点项目“《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三进’教学引领高校外语课程思政建设研究”(23VSZ0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廖峻,男,四川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德语文学、翻译及课程思政研究。

引用格式:廖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德文版中的翻译创造性探析[J].外国语文,2024(4):171-182.

年来从个别试点到全面推广,“三进”工作已经在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至三卷多语种版本的文本分析、学理探索、课程思政与教学实践等方面做出了较为丰富的研究和探索。然而另一方面,根据杨安文等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国内翻译研究现状所做的细致梳理,当前仍存在核心期刊发文不足、关注点多元而不深入、定性研究多于定量研究、非英语语种与少数民族语言译本研究数量过少的问题,他提出要继续深入探索方法理论、结合“三进”思政工作进行翻译课堂教学研究、拓展文本翻译语类和范围等一系列具体建议(杨安文等,2023:13-14)。

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指出:“广大青年一定要勇于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青年是社会上最富活力、最具创造性的群体,理应走在创新创造前列。”(习近平,2014:279)因此,我们在“三进”工作中也必须把对青年外语人才创造力的培养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的各门课程中都进一步关注对学生创造力的培养,其中也包括参加“三进”的外语专业本科及研究生翻译类课程。从外在而言,不论是同步培育翻译技能+课程思政,将跨文化交际、中国话语外宣传播方式、新媒体运用等诸多元素导入翻译鉴赏类课程的川外实践(冯千等,2022:16),还是在各语种翻译实践课程(口译、笔译、视译等)中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版本作为翻译实践文本直接引入,并在翻译专业理论和研究方法类课程中积极融入思政元素的北外模式(贾文键,2021:66),翻译类课程都在教师、学生、教材、教法等多方面具备培养创造力的条件和优势;从内在而言,翻译天然地具有“交流、传承、沟通、创造与发展”五个方面的核心价值,广义的翻译过程各阶段都能体现出创造性,翻译“本身就孕育着一种求新求异的创造精神”(许钧,2023:2-3)。因此,对翻译创造性的生成、表现与作用等问题进行探讨,将有助于深化对于包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版本在内各种翻译活动和现象的认识。

1 翻译创造性与外宣翻译

现代汉语词典对“创造性”一词的解释是“努力创新的思想 and 表现;属于创新的性质。”杜登德语词典上对“kreativ”(有创造性的)一词的释义为“schöpferisch; Ideen habend u. diese gestalterisch verwirklichend”,可译为“具有创新性,思想丰富并能以创新方式加以实现”。旁氏现代德语学习词典上对“kreativ”的释义与杜登如出一辙:“voller neuer Ideen und fähig, diese umzusetzen”,即“充满新思想并有能力将其实现”。由此可见,德语中的“创造性”一般被认为包含两个元素:创新性和可实现性。德国学者普赖泽尔在其《创造性研究》一书中则从“新颖性”(Neuigkeit)和“适当性”(Angemessenheit)两方面对此概念内涵进行界定(Preiser, 1976:65),这与词典上的解释可谓不谋而合。另一位德国学者库斯毛尔则用一个非

常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这两种性质的有机统一:一个设计师可以设计出一辆新型豪华三层旅行车,在驾驶舱上面再加上一层花园和一层游泳池,这样的汽车当然非常吸睛,满足“新颖性”的要求,但是制造商会拒绝进行生产,因为它不符合车辆有关标准,制造成本太高,也不会有消费者掏钱购买,它缺乏“适当性”,不能转化成现实产品(Kußmaul, 2015: 126)。

在现实生活中,“新颖性”不难实现,但如何能与“适当性”取得协调而成为现实则是一项难题,一味标新立异只会导致舍本逐末,走入歧途,而只在极端实用主义的层面上兜兜绕绕,则会失去对长远发展和本质探究的渴望,无法真正提升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和把握水平。因此,虽然创造性的产生所涉及的潜意识或无意识因素尚未完全被人类认知,但它并不完全是神秘莫测的灵光一现,而是基于适应和改造现实世界的需要,能够被我们认识和分析的一种思维过程。卡内基将其称为“创造型想象力”,它与更常用的“综合型想象力”一起,在那些目标明确、信念坚定、长期坚持的人身上会发挥超凡的作用,帮助他们取得成功,而这两种想象力都是可以通过使用进行培养的(希尔, 2021: 2-20)。

第二个问题:翻译是否具有创造性? 传统观念认为,原文创作者才具有原创性,翻译受限于原文,不能超出原文的边界,译者并没有自主创作的权力,译者的社会地位也“理所当然”地低于作家、记者、编辑等其他文字工作者,译者至多不过是“戴着镣铐的舞者”。而高校中翻译类课程对学生一般的要求也是“忠实”和“正确”,对学生的学习成果多是从此方面进行考察评价,从而进一步抑制了教学双方对翻译创造性的认识。有人认为,当前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已使人类的外语学习显得愈发低效,翻译的角色更容易被机器取代。在此背景下,教与学的矛盾进一步凸显,有些学生借助 ChatGPT 完成的翻译作业似乎更加“出色”,却并没有掌握应有的语言知识和翻译技巧。事实上,“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大多是无意识发生的。当译者在追求忠实于原文的时候,规定着他的理解的前结构必然在不被察觉中发挥着作用,如此,‘创造性叛逆’已然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在哲学诠释学的视域下,翻译的意义永远不是对原本意义的正确重现——事实上,所有的翻译都无法真正做到重现”(王冠, 2024: 68)。既然如此,那么真正优秀的翻译必然能够体现出创造性,这种创造性恰恰是人工智能最无法取代的部分。人工智能可以确保语义的正确和句子的流畅,但是它冷冰冰的“正确性”却缺乏打动人心的力量,更无法给人带来灵感迸发瞬间那种莫大的幸福感。

笔者曾在翻译课堂上与学生讨论过严歌苓当代小说《金陵十三钗》的书名翻译问题。作者严歌苓给自己这本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小说所取的中文书名非常巧妙,短短五个汉字既有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含义,又概述了全篇的内容和主题。如果采取直译的方法,完全会令西方读者感到不知所云,即使是 ChatGPT,也只能给出“*Die dreizehn Schmuckstücke von Jinling*”(Jinling 的十三块装饰品)这样看似正确,却让人不知所云的翻译答案。实际上,英国汉学家韩斌(Nicky Harman)找到了一种创造性的翻译方法,将其译为 *The Flowers of War*(英文直译:

战争中的花朵)。虽然该译法丢失了地点和数量的信息,但她巧妙地找到了其中的关键文化信息点——以花朵比喻女性,中外皆然。而且,这里还点出了宏观的战争背景,战争中的女人们,也会像炮火下的花朵一样,其美丽和青春被无情地吞噬。不论是中文的以钗喻人,还是英文的以花喻人,都是含义隽永,令读者的阅读期待被标题带动起来。格雷塔·伦斯(Greta Löns)根据韩斌英译本翻译了小说的德译本,她也没有直接按照英文版标题去直译,而是根据小说故事的人物和内容另行选择了一个平实朴素的书名 *Die Mädchen von Nanking*,回译为英文就是 *The Girls of Nanking*。除了点出了故事发生的具体地点以外(实际上绝大多数德国读者也并不知道 Jinling 或 Nanking 在哪里),其他信息在学生们看来都乏善可陈,味同嚼蜡。笔者则认为,考虑到德国文学传统中也有席勒的《奥尔良的姑娘》(*Die Jungfrau von Orleans*) 等类似的书名,似乎这种简单化处理也有适合其本国文化土壤的可行性。

然而,马尔姆克亚尔(Malmkjær)(2022:116)在其《翻译与创造性》一书中提出:“如果译者对原文采取的是美学态度,那么将更有可能产出创造性译文。”马尔姆克亚尔并没有对何谓“美学态度”给出明确的定义,而是在该书第四章中通过具体的文学译例分析,从效果方面来给出了自己关于美学态度与翻译创造性之间关系的阐释:因为美学态度适用于任何现象,包括翻译这样一种“描述”,所以译者必须努力运用美学态度所包含的描述性因素来对待翻译任务。对原文的“美学关注”意味着尽管译者对原文的了解和分析精细入微,甚至可以提供“带注释的翻译”,但他不会试图去复制原文的所有特征,而是在细致分析的基础上明确自己翻译时要实现的目标具体有哪些,并根据一些现实因素进行重点取舍和改动。如果译者努力的目标是让译文能够吸引读者也用美学态度去进行阅读,那么这也反过来促进翻译的创造性(马尔姆克亚尔,2022:121-169)。我们可以将这种“美学态度”概括为翻译创造性基于“新颖性”和“适当性”之上的第三种体现特征:“美学性”,即在关注译文的形式和功能之上,更加注重传达出原文的内在价值和情感取向,实现形式与内容的水乳交融,浑然一体,让读者在信息获取之外能够升华获得“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样更高级的文学审美体验。

回到上文所述的《金陵十三钗》,如果从“美学性”角度出发,笔者会建议给出另一种德文译名的可能:“*Die Rosen im Sturm*”(德文直译:暴风雨中的玫瑰)。这种创造性的解决思路并非完全凭空产生,而是有明显的思想溯源查考——首先是英文版译名中 flowers 的启发,让人联想到德语的 Blumen(花),再从 Blumen 这个大类中抽取出具体的一种更具有女性象征意义的 Rosen(玫瑰花)。接下来就是基于译者日常文学背景积累的那一刻灵感迸发,联想到德国启蒙代表作家莱辛的代表剧作《艾米莉亚·加洛蒂》中那句最著名的台词“Eine Rose gebrochen, ehe der Sturm sie entblättert!”(摘取下那朵玫瑰吧,在暴风雨将它摧残之前!)而 Sturm(暴风雨)也正是德语中经常用以比喻战争的喻体,符合小说的故事背景。由此,“暴风雨中的玫瑰”这样的创造性译名终于得以在译者头脑中成型。正如“金陵十三钗”在比喻中

暗含了中国文学文化典故一般,“暴风雨中的玫瑰”也在比喻中暗含了德国文学文化典故,令学生们拍案叫绝!这就是翻译创造性的体现,是人工智能无法企及的智慧之花。

本节探讨的第三个问题在于:外宣翻译是否需要创造性?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一般的观点认为外宣翻译涉及的是国家利益、国家形象,影响深远,意义极其重大,因此就必须小心谨慎,以忠实正确为最高准绳。这一观点当然是正确的,但在现实操作中往往容易演变为谨小慎微、死板机械,成为某些译者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免责声明”。虽然近年来外宣翻译资料在数量上有了迅速增长,但在质量上却没有同步改善,外宣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出现失衡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外宣译者缺乏创新意识,竞争力不强”(肖成笑,2020:99)。

张健区分了广义与狭义的外宣翻译,认为外宣翻译“指在全球化背景下以让世界了解中国为目的、以汉语为信息源、以英语等外国语为信息载体、以各种媒体为渠道、以外国民众(包括境内的各类外籍人士)为主要传播对象的交际活动”,“在外宣翻译中,译者还需要在与原文作者统一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翻译,即从译者角度出发,用译入语的认知和思维表达方式创造性地将原文转化成为易于读者接受的译文”(张健,2013:22,39)。王家根则认为,外宣翻译宜理解为“中国各类对外宣传材料的翻译”,需要兼顾真实性、灵活性、严谨性、创造性、政治性、时代性这六个方面的特点。其中,鉴于中外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和译者与读者之间意识形态的不同,在必要时,译者也应该在忠实的基础上发挥创造力,把握住原作的精神,同时把中国人的思想感情、生活体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融入译语中,运用适合原作风格的语言,把原作的内容和形式正确无遗地展现出来(王家根等,2019:5-7)。不难看出,两位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外宣翻译中创造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也不忘谨慎地提醒读者,这样的创造性不是天马行空的随意发挥,而是建立在“与原文作者统一的基础”“忠实的基础”上的。反过来说,如果不能以富有创造性的方式赋予原作以生命,这样的忠实很可能就是平庸的,甚至是毫无意义的(王家新,2018:6)。

以此看来,前文所述德国学者所提出的“新颖性”与“适当性”相统一的原则在外宣翻译领域同样适用,而在此基础上向“美学性”的靠拢,则是对译者提出的更高要求,尤其是“美学性”所关注的内在价值和情感取向,恰恰是外宣翻译在处理具有文学色彩的文本时特别需要重视的方面,也是翻译创造性的高度体现。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德文版译例探析:基于翻译创造性的考量

作为典型的政治外宣文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德文版延续了第一至三卷的思想脉络和语言形式,在语言转换、文化输出、交际效果三方面维度上都体现出翻译创造性的价值,即“新颖性”与“适当性”的统一,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向“美学性”的靠拢,值得我们

学习研究并在翻译课程的教学参考借鉴。需要反复强调的是,这三方面维度并非截然区分,而是相互联系,相互融合的。

2.1 语言转换维度

(1)在这场严峻斗争中,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顽强拼搏,充分发挥了……广大医务工作者义无反顾、日夜奋战,展现了……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闻令而动、敢打硬仗,展现了……广大人民群众众志成城、守望相助,……广大公安民警、疾控工作人员、社区工作人员等坚守岗位、日夜值守,广大新闻工作者不畏艰险、深入一线,广大志愿者等真诚奉献、不辞辛劳,为疫情防控作出了重大贡献。(习近平,2022:92)

译文(1) In dieser ernsten Gesundheitskrise haben alle Parteiorganisationen sowie Parteimitglieder und Kader offensive und hartnäckig gekämpft und ... Die unzähligen medizinischen Mitarbeiter, die sich rund um die Uhr entschlossen und selbstlos aufopfern, um... Die Offiziere und Soldaten der Volksbefreiungsarmee zeigten sich sofort einsatzbereit, mutig und kampferprobt-sie haben... Die Bevölkerung zieht fest an einem Strang und steht einander bei... Die Polizeibeamten sowie die Mitarbeiter des Infektionsschutzes und der Einwohnerkomitees waren Tag und Nacht im Einsatz, Journalisten haben furchtlos direkt vom Ort des Geschehens berichtet und die vielen freiwilligen Helfer haben keine Mühen gescheut und mit echter Hingabe ihren Beitrag zur Eindämmung der Pandemie geleistet. (Xi,2023: 47.)

本段充分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善于利用汉语中的四字词语,在篇章上构成排比以增强文学色彩和行文气势的特点,原文全部采用了“主语+四字词语×2”这样的形式,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顽强拼搏”“医务工作者+义无反顾、日夜奋战”等等。这些四字词语中既有“众志成城”“不辞辛劳”这样的成语,也有“敢打硬仗”“真诚奉献”这样的表述性非成语类四字格熟语,具有非常浓郁而典型的中国语言文化特色。从这些四字词语的内部结构上看,也是多种形式并用,有动宾式如“坚守岗位”、补充式如“冲锋在前”、偏正式如“顽强拼搏”等等多种形式。

作为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的德语从语系上讲与汉语毫无亲缘关系,在语言结构和语法体系上都无法实现与汉语形式上的对等,这就要求译者积极发挥创造性,从宏观的篇章角度出发,通过词类转换等多种方式灵活处理译文。从此例来看,译者对第一组“四字词语×2”采取的是将其转换为“形容词×2”放入完成式“haben gekämpft”的方式进行处理,即“积极地、顽强地进行了战斗”;对第二组“四字词语×2”则将其转换为“名词+后置定语从句”的形式,即“下定不顾时间长度的决心,无私奉献的某某人”;对第三组“四字词语×2”又变换为“主语+动词补足语即表语”的形式,即“军人展示出某种精神”。后面的几组“四字词语×2”上的语言转换也是完全打破汉语原文的格式,不再赘述。

本段译文的创造性其实体现在遣词造句的多个方面,但就段落整体而言,它尤其体现在译者不刻意在德语中去追求某种固定的结构和形式与原文加以对应,而是灵活地根据目的语本身的语言特点选择表达方式,在语言结构上创新性地使用“一对多”的翻译策略上,而这样的非排比形式才更加适合德语表达习惯,也顺利传达了原文的价值观,能够让德语区读者感受到充溢在字里行间的那种团结一致、共同抗疫的决心和行动,这就是马尔姆克亚尔所说的以“美学态度对待原文”,可以说是在“新颖性”“适当性”和“美学性”上都体现出了翻译创造性的特征。

(2) 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全国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个人冷暖、集体荣辱、国家安危融为一体,“天使白”“橄榄绿”“守护蓝”“志愿红”迅速集结,“我是党员我先上”、“疫情不退我不退”,誓言铿锵,丹心闪耀。14 亿中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肩并肩、心连心,绘就了团结就是力量的时代画卷! (习近平,2022:99.)

译文(2) Im ganzen Land zogen die Menschen fest an einem Strang und verbanden das Wohl des Individuums, Kollektivs und Landes miteinander. Medizinisches Personal, Armeeangehörige, Polizisten und Freiwillige versammelten sich umgehend, beschworen feierliche Eide wie „KPCh Mitglieder gehen voran!“ und „Kampf bis zum Ende der Pandemie!“ und bezeugten damit ihre unverbrüchliche Treue. 1,4 Milliarden Chinesen saßen in einem Boot und legten sich mit vereinten Kräften in die Ruder, um durch die Pandemie zu steuern. Dies bot ein aktuelles Beispiel für das Motiv-Einigkeit macht stark! (Xi, 2023:115.)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讲话语言生动,形式灵活,既有“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这样文学化的四字短语,也有“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样的俗语和“天使白”“橄榄绿”等这样的借代,还有“共呼吸、共命运,肩并肩、心连心”这样极具感染力和亲和力的口号,以此回顾了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团结一致战胜疫情的伟大历史。

对于如此丰富的语言表达,译者也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对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这组类似于例(1)的“四字词语×2”,采取了高度简化的处理“in ganzem Land”,即“在全国”,避免了德语中过度文学化的冗余信息。而对于俗语“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翻译也非常值得关注,此处使用的是“fest an einem Strang ziehen”(紧紧牵住一根绳)这样的德语俗语进行类同翻译,而同样的表述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德文版中的翻译是“sich zielstrebig denken und handeln”(朝着目标思考和行动)(Xi, 2014: 47)。笔者认为这种译法的差异本身并不奇怪,一是“an einem Strang ziehen”这句俗语本身就是“das gleiche Ziel verfolgen”,即“同心协力,追求同一目标”之意,第一卷的译法只是更加直接显化的处理而已,二者并无表达核心内容上的差异;二是从翻译创造性的角度来看,经过十年来的发展优化,第四卷的翻译在此处显然比第一卷的处理更加贴近原文的文学化特点,更加具有“美学性”

特征。

本段的第三个关注点在于“天使白”“橄榄绿”“守护蓝”和“志愿红”这四组借代,在当代中国人的背景知识体系下,我们都非常清楚它们分别对应的是医务人员、军人、警察与志愿者,此处是用他们制服的颜色特征去代替了其职业本身的称呼,特点鲜明,形象生动。然而对于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德语国家人士而言,同样的色彩却无法让他们产生同样的职业联想,更没有我国抗疫背景下那样的文化情感联系。因此,此处的德文翻译明显需要去除原文的某些“美学性”特征,采取平直的译文,直接给出相应的职业称谓,这是“适当性”起到更加明显作用的例子。

“共呼吸、共命运,肩并肩、心连心”,这四个同义结构短语在表达上非常有语势和气势,也极具感染力和亲和力,但如果一味死板地追求形式上的逐一对等,也必然会造成译文结构臃肿、逻辑混乱、指向不明,这些冗长的信息不仅毫无价值,也无法实现外宣效果。其实经过文本分析不难看出,这四个短语的核心意思其实是在于“共命运”,而这在中文和德语中恰恰都可以找到一个具有共同点的同义表达,即中文的“同舟共济”和德语的“坐在一条船上”(in einem Boot sitzen)。在此句之后,用“legten sich mit vereinten Kräften in die Ruder, um durch die Pandemie zu steuern.”(同心协力划桨,闯过疫情时期)进一步结合抗疫的时代背景,与上下文联动说明了全国人民在党领导下的“共命运”。笔者在此处也对比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德文版的译法,彼处的处理是“sich stets mit dem Volk zu identifizieren, in einem Boot zu sitzen, das gleiche Schicksal zu teilen sowie eine Herz und eine Seele zu bilden”(Xi, 2021: 180)很明显,第四卷德文版在第三卷的基础上进行了相当大的简化处理,而且更加紧密结合了此处使用的具体语境,创造性发展而非死板沿用,这也是“适当性”原则在翻译中发挥了作用。

2.2 文化输出维度

(3) 干部……不能在“月黑风高无人见”的自欺欺人中乱了心智,不能在“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的花言巧语中迷了方向,不能在“富贵险中求”的侥幸心理中铤而走险,不能在“法不责众”的错误认识中恣意妄为。(习近平,2022:534)

译文(3) ... Macht euch selbst und anderen nicht vor, dass im Dunkeln gut munkeln ist. Setzt nicht um des Reichtums willen eure Integrität aufs Spiel und lasst euch nicht in dem Irrglauben gehen, dass das Gesetz nicht mehr gilt, wenn viele dagegen verstoßen. (Xi, 2023: 638)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讲话中蕴含了丰富的中国文化内涵,包含了一则历史名人典故和民间俗语“富贵险中求”以及成语“自欺欺人”“花言巧语”“法不责众”等。此处仅就历史典故“月黑风高无人见”“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展开分析。这则故事说的是东汉名臣杨震在调任太守上任途中路过昌邑,当地县令王密为感谢杨震提携之恩,在一天晚上准备了十斤金子给

他送去。王密对自己的恩人说:“暮夜无知者。”没想到杨震拒绝收受,正色斥道:“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王密听后“愧而出”,而杨震也被后世尊称为“四知太守”。习近平总书记用这则典故来告诫教育党员、干部不要被外部世界的物质利益所诱惑,要守住内心,知行合一,清廉从政。

王立群(2018)认为,一个典故的意义至少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典故最初生成时的意义;二是在文化传承的进程中典故被不断运用的意义,这个意义可能会产生变化;三是当下使用的意义。简单认识一个典故的意义,关注其当下使用的意义也能粗略理解,但要深入理解一个典故的意义,这三者不可或缺。理解典故,不能脱离其生成的语境、历史中使用的语境以及当下运用的语境。在外宣翻译中,理想的状态当然是实现目的语读者能在读到译文后产生与原语读者相同或相似的感受,但是就现实而言,一般还是需要尽量少用注释等手段增加目的语读者的阅读认知负担。因此,通过翻译使目的语读者了解中国典故是必要的,但是要把握好这个度,那就是优先确保他们能在当下的语境中理解典故的基本文化内涵意义。如果还有提升的可能,那就是让外国读者对典故在中国文化传承中的意义有所了解。至于最高的境界,那就是激发读者对于中国文化典故来源及发展的兴趣,使其能以读到的这个片段为出发点,深入研究中国的文化。

在关于杨震的这则典故的德译中,译者追求的是第一重境界,采取的是把相关的两句引语都浓缩到一句命令式从句中的方式。“Macht euch selbst und anderen nicht vor, dass im Dunkeln gut munkeln ist.”(不要欺骗你们自己和其他人,以为在黑暗中就可以私下议论)这个命令式与下文的另一句命令式在形式上相对,把原文中的四个“不能”从语义上凝练成两个,基本上能够实现交际目的。但是如果以王立群所说的三个层面来看,这样的处理方式离文化输出的理想效果还有一定差距,德国读者不仅很难读出中国文化典故的意味,甚至还可能会以为这是不允许官员随意交流和发表自己的意见。以翻译创造性的角度来考察,笔者认为这个译文有其“新颖性”,但在“适当性”和“美学性”上似乎还有值得商榷之处。

与此可以参考类比的是,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习近平称赞贾大山同志“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德文版中对该典故的翻译是“so wie es in der Prosa *Über das Yueyang-Gebäude* heißt: Sich auch an einem abgelegenen Wohnort darüber Gedanken machen, ob der Herrscher das Land gut regiert”。(就像在散文《岳阳楼记》中所写的:即使住在偏远的地方,也想着君主是否把国家治理好了)(Xi, 2018:390)。笔者认为此种释义性的翻译处理方式的优点倒不在于其通过似嫌冗长的说明基本实现了“忠实”和“正确”,而是它补充给出了这个典故的来源是《岳阳楼记》,让某些对此感兴趣的外国读者可以从王立群所说的了解典故的第一层面逐渐过渡到第二、第三层面,这样的处理方式应该可以说就是在“新颖性”“适当性”和“美学性”的三重维度上都取得了较好的协调。

2.3 交际效果维度

(4)很高兴和大家相聚“云端”,共同庆祝……(习近平,2022:439.)

译文(4) Ich freue mich sehr, mit Ihnen per Videoschlechte zusammenzukommen, um ... zu feiern. (Xi,2023:524.)

(5)事实证明,将疫情政治化、污名化,搞“甩锅”、推责,干扰的是全球合作抗疫大局。(习近平,2022:457)

译文(5) Die Tatsachen haben gezeigt, dass die Politisierung und Stigmatisierung des Virus oder die Schuldabwälzung nur zu einer Beeinträchtigung der globalen Zusammenarbeit gegen die Pandemie führen. (Xi,2023:547.)

此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接地气”地使用网络流行语的两个例子。例(4)是他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的开场语,例(5)则出现在他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上的讲话中,这两次会议都是以视频方式召开的,因此习近平总书记会使用到“云端”这个词汇。在当今的中文语境下,我们见到“云端”这个词已经不会只想到其在中文里“云中,云上”的原初意义,而是都明白这在此语境下是一个计算机网络用语,指作为接受服务的对象,不管在何时何地,都能享受云计算(Cloud Computing)提供的服务,“云”不过是网络、互联网的一种比喻说法而已。然而,这并不等于“云端”其他端口的用户,即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在其习惯的政治外交语言层面不会因为这样的网络流行语而产生一时的交际障碍,毕竟无论是德语的“Wolke”,还是英语的“cloud”,从这一场景的交际效果来看,都不如按照规范的德语用法直接写明具体的交流方式是“per Videoschlechte”(通过视频窗口)更加易于理解,不会引发任何歧义。

同理,例(5)中的“甩锅”也是最早出现在电竞游戏中的网络流行语,指将自身的矛盾转移出去,让别人来承担责任,从而推卸自己责任的行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部分美国政客频频在抗疫及其他国际问题上肆意诬陷抹黑中国,我国在官方回应中高频使用“甩锅”一词。与“推卸责任”“转嫁祸端”等这样的表达相比,“甩锅”的形象色彩更强,表达效果上也更加鲜明生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甩锅”一词的传播与流行,展现出其不同于一般网络流行语的较强生命力(殷树林等,2020)。然而,对于网络流行语的翻译,我们需要特别慎重,因为网络流行语呈现的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融,时代的进步和多元化的世界文化深度融合,其翻译不仅要考虑传递交流信息,还要考虑中国网络新时代的文化特征,以及目标语受众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和用法习惯(孙雪梅等,2020:88)。译文(5)注意到了“搞‘甩锅’”与接下来的“推责”是同义重复,只是在中文表达中使用这个网络流行语来增强语气的一种方式,故而完全没有必要在“Schuldabwälzung”(推责)之外再画蛇添足,就已经完全达到了预期的交际效果。翻译创造性并不是只表现在“增”和“变”上,也能表现在译者有意识的“减”中。

总体而言,在本节所举的五个例子中均能找到翻译创造性在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为代表的外宣翻译中的表现,大多都能实现“新颖性”与“适当性”的统一,实现外宣翻译应有的传播效果。当然,如果以一种“译无止境”的心态来不断追求完美,那么对译文的“美学性”就可以提出更高的要求标准,更充分地发挥翻译创造性,在审美层面上不断向习近平总书记的原文旨趣靠拢。

3 结语

在“三进”工作中,无论是“以课程建设为中心,整合各类育人资源,积极探索在课程建设中实现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融为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打好铸魂育人‘主动仗’”(邹渝等,2021)这样的整体把握,还是“结合产出导向法的教学理念,提出逆向探析适合‘三进’课程的课堂教学设计路径,即‘多维整合型’教学路径”(胡业爽等,2022:31)这样的具体实践,究其根本,都是培养具有“政治领悟力、国际传播力、卓越翻译力、外事沟通力、文化交流力”的高素质创新型外语人才,产出创新性成果,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繁荣进步。

在这样的恢弘愿景下,对于新时代中国外语及翻译相关专业大学生来说,就要求他们努力提升自己的外语素养与国际传播能力。一要提升自己的精准翻译能力。能准确、忠实、自然地翻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话语,这就要求外语专业学生熟悉我们的党情、国情和社情。二是要学会中国故事的国际表达。要创新表达方法,注重中外融通,用外国人听得懂、传得开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祝朝伟,2024:8)。对于新时代的教师而言,要更加有意识地在语言和翻译教学中灵活使用包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版本在内的各种外宣翻译材料,把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更好地发挥“三进”对高校外语课程思政建设的引领作用。

参考文献:

- Kußmaul, Paul. 2015. *Verstehen und Übersetzen*[M]. Tübingen: Narr Francke Attempto Verlag.
- Preiser, Siegfried. 1976. *Kreativitätsforschung*[M].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 Xi, Jinping. 2014. *Xi Jinping: China Regieren I.* [M]. Beijing: Verlag Für Fremdsprachige Literatur.
- Xi, Jinping. 2018. *Xi Jinping: China Regieren II.* [M]. Beijing: Verlag Für Fremdsprachige Literatur.
- Xi, Jinping. 2021. *Xi Jinping: China Regieren III.* [M]. Beijing: Verlag Für Fremdsprachige Literatur.
- Xi, Jinping. 2023. *Xi Jinping: China Regieren IV.* [M]. Beijing: Verlag Für Fremdsprachige Literatur.
- 冯千, 黄芳. 202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三进”课程思政建设实证研究——以日语翻译鉴赏课程的“三进”导入为例[J]. 外国语文(3):16-24.
- 胡业爽, 徐曼琳. 2022. “三进”课程的课堂教学设计路径逆向探析——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俄文版翻译鉴赏课程为例[J]. 外国语文(3):25-32.
- 贾文键. 2021. 发挥翻译专业特色, 谋划翻译课程思政——翻译本硕专业课程思政的北外实践[J]. 中国翻译(5):65-69.
- 科斯滕·马尔姆克亚尔. 2022. 翻译与创造性[M]. 张倩, 译.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 拿破仑·希尔. 2021. 思维致胜[M]. 王海燕, 译.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 孙雪梅, 刘昊哲. 2020. 网络流行语的形成特点及价值意蕴[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17): 86-88.
- 王冠. 2024. 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一种哲学诠释学解读[J]. 国外社会科学前沿 (2): 66-75.
- 王家根, 孙丽, 赵联斌. 2019. 外宣翻译理论导论[M]. 芜湖: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王家新. 2018. “创造性翻译”理论和教学实践初探[J]. 写作 (8): 5-10.
- 王立群. 2018. 典故的意义——《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观后[EB/OL]. <http://cpc.people.com.cn/n1/2018/1015/c419242-30340318.html>
- 习近平. 202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 习近平. 2014. 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2013 年 5 月 4 日)[G]//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 肖成笑. 2020. 一带一路视域下外宣翻译人才培养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研究[J]. 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 (上旬刊) (5): 99-100.
- 许钧. 2023. 数字化时代中华文化译介与创新——从翻译的创造性谈起[J]. 翻译研究 (2): 1-7.
- 杨安文, 张文莉, 谭瑶. 2023.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翻译研究综述[J].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6): 1-18.
- 殷树林, 杨帅. 2020. 漫话“甩锅”[N]. 光明日报, 2020-09-04.
- 张健. 2013. 外宣翻译导论[M].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 中国外文局. 2023. 推动“三进”工作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修班开班式举行[EB/OL]. http://news.china.com.cn/2023-08/22/content_106067805.shtml
- 祝朝伟. 2024.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外语专业的“教”与“学”[J]. 当代外语教育 (9): 1-11.
- 邹渝, 董洪川. 2021. 抓好课程建设“主战场”打好铸魂育人“主动仗”[N]. 光明日报, 2021-06-07.

The Creativity in German Translation of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IV*

LIAO Jun

Abstract: In multilingual versions of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translation creativity is prominently reflected in language conversion, cultural output, communication effectiveness, and other aspects. Analyzing and researching it is not only beneficial for deepening the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of political publicity, but also in lin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ree-into” Pilot Reform and talent cultivation. Sorting out the academic understanding of creativity in publicity translation from a macro level and analyzing the translation examples in the German version of *Volume IV* from a micro level can be helpful to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 and role of creativity in publicity translation. The three dimensions for examining translation creativity: novelty, appropriateness, and aesthetics, places more emphasis on cultivating students’ creativity in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teaching, and better plays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Three-into” Pilot Reform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Key words: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IV*; translation; creativity; “Three-into”

责任编辑: 朱晓云